

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文化视野下的 山歌认同与差异

——以河州“花儿”与陕北“信天游”比较为个案

WENHUA 李雄飞 著

SHIYE XIA DE

SHANGE

RENTONG YU

CHAYI

民族出版社

文化视野下 的山歌认同与差异

——以河州“花儿”与陕北“信天游”比较为个案

李雄飞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视野下的山歌认同与差异/李雄飞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5. 9

ISBN 7-105-07253-9

I. 文... II. 李... III. 山歌—文学研究—西北地
区 IV. I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9663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绿冬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数: 220 千字

印数: 0001 - 1000 册 定价: 1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64271907;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内 容 提 要

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我国西北高原流传历史最为悠久、流传地域最为辽阔的两种山歌——“花儿”与“信天游”进行了较深层次的对比讨论,力求在解剖“花儿”、“信天游”及其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提升人们对于我国歌谣学的理性认识与山歌文化的思维判断。作者认为:

山歌文化是人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的凝聚体,是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山歌本身、民间歌手、听众群体、唱歌情境等组成山歌文化。山歌是山歌文化的本体,民间歌手是山歌文化的主体。山歌文化的个体性与集体性、随意性与表演性、含蓄性与开放性、稳定性与变异性、地域性与普及性、落后性与先进性、娱乐性与教育性、单一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等许多性质是相互矛盾又自成一体的。山歌文化特质组合、山歌文化丛的衍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任何山歌文化的产生都有一个长期的历史积淀过程,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终极原因是人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所引起的矛盾运动结果。山歌文化的“源”与“流”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山歌文化内部任何因素发生改变,往往会影响到其他因素相应发生程度不等的变化。山歌文化的运动过程从山歌文化特质改变开始,山歌文化丛的变化继之,然后在多种创造形式并存的局面当中形成山歌文化的空间流布范围和历史传承层面。山歌文化永远处在一种量变与质变的循环过程中,永远处在一种绝对运动

与相对稳定的状态里。

对于某种山歌的研究应当先从歌词曲调开始,接着深入到民间歌手的内心世界之中,然后深入到山歌文化之中,最后应当深入到与山歌相关的自然、社会、文化、人的当中而去。山歌文化特质之间,山歌文化组成部分之间,山歌文化相互之间,自然、社会、文化、人各自与山歌文化之间,无不处在一种互相独立与互相依赖、互相矛盾与互相协调、互相作用与互相影响的动态关系之中,处在一种彼此由平衡走向不平衡、由不平衡再次达到新的平衡的永恒变化之中,影响着整个山歌文化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也影响着每种山歌文化充满个性色彩的沉浮兴衰。

一种山歌与另一种山歌之间,既含有共同之点,又存在相异之处。身体力行的“田野作业”方法,原貌本真的完整描写方法,理性而审慎的认识对象方法,科学有序的逐项比较方法,“量化”到“质化”的逐级归纳方法,内外结合的联系分析方法,相关因素的换位思辨方法,典型结论与一般原理的相互推导方法等,是弄清某种山歌本来面目和所有山歌共性所在的有效研究方法。

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各地的传统山歌文化在急剧衰落,精品山歌飞越了时代地域的界限而走向全国,进入世界。山歌文化融入世界文化圈成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因此,妥善、尽早地收集保存与适度、适时的改编创新是山歌未来最好的两条出路。

上述研究表明,建立山歌文化体系的构想能够成立,创立山歌文化学的学科构架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

关键词: “花儿” “信天游” 山歌文化

目 录

导 言	(1)
-----	-------

第一编 山歌文化源流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第一章 山歌文化自然生态系统缕析	(26)
第一节 山岭、峡谷、盆地上摇曳的“花儿”	(26)
第二节 丘陵、沟壑、荒漠中飘荡的“信天游”	(31)
第三节 空间系统内的山歌文化	(35)
第二章 山歌文化的生成程序	(43)
第一节 “花儿”文化因子的历史沉积	(43)
第二节 “信天游”文化特质的萌生步骤	(48)
第三节 山歌文化原型的模塑过程	(54)
第三章 山歌文化的嬗变形态	(62)
第一节 “花儿”文化丛的动态进化顺序	(62)
第二节 “信天游”文化丛的纵向流变脉络	(67)
第三节 山歌文化的链式传承与繁荣轨迹	(71)



第二编 山歌文化体系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第一章 山歌文化的民族性	(82)
第一节 多民族文化系统叠合中的“花儿”	(82)
第二节 多源合流的汉族“信天游”文化	(87)
第三节 山歌文化与民族文化	(90)
第二章 山歌文化的社会性	(98)
第一节 河湟社会与“花儿”文化	(98)
第二节 陕北社会与“信天游”文化	(104)
第三节 社会与山歌文化的辩证统一	(108)

第三编 山歌文化本体的同一性和多样性

第一章 山歌曲调的构成分析	(118)
第一节 “花儿”的乐体组合框架	(118)
第二节 “信天游”的曲式结构体系	(123)
第三节 山歌音乐模式的内部排列组合	(127)
第二章 山歌歌词的整合模式	(135)
第一节 “花儿”词句搭配的有序性	(136)
第二节 “信天游”唱词编制的规律性	(141)
第三节 山歌歌词的程式化组装	(148)

第四编 山歌文化主体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第一章 山歌文化的情境构成	(160)
第一节 “花儿”演唱场合的风俗酿造	(160)



第二节	歌唱“信天游”的社会情境·····	(166)
第三节	山歌演唱场景构成剖析·····	(171)
第二章	群体歌唱观念视阈与山歌文化差异 ·····	(177)
第一节	河州“花儿”的文化观念·····	(177)
第二节	陕北“信天游”的文化意识·····	(182)
第三节	心想口唱的歌手与观众·····	(187)

第五编 山歌文化流变的共同性与个别性

第一章	山歌文化的效用之力 ·····	(198)
第一节	“不死了就这个唱法”的“花儿”·····	(198)
第二节	“信天游永世唱不完”·····	(203)
第三节	山歌文化的功能自足系统·····	(210)
第二章	山歌文化的流布体系 ·····	(216)
第一节	“花儿文化”的扩散途径·····	(216)
第二节	“信天游”文化的传播方式·····	(222)
第三节	山歌文化的流布与“涵化”·····	(227)
第三章	山歌文化的蜕变与发展趋势 ·····	(235)
第一节	世纪之交的“花儿”文化现状·····	(235)
第二节	时代变革中的“信天游”文化·····	(240)
第三节	山歌文化的困境与展望·····	(244)
结 语	·····	(259)
参考文献	·····	(263)
后 记	·····	(269)



导 言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从脱离动物、作为“人”的那一天起,喊出的第一个或高或低、或清亮或嘶哑、或尖利或浑浊的声音就是山歌,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出的第一声呼喊。从此以后,这个世界上便有了歌声——既包括或许没有内容的歌词,又包括或许不成腔调、也许是噪音的音乐;有了歌手——不管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是多么的拙劣而幼稚;有了观众——无论那是自己、别人还是群体;也有了唱歌的地点情境——也许在山顶、峡谷、森林、河岸、洞穴……也就是那一刹那或者之前之后,人类开始了自己的文化缔造史。如果把始祖当时的“创造”叫做文化——山歌文化的话,山歌文化便是人类文化的源头之一。鲁迅先生说过:“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我们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①

从那时起,这种原初的声音穿越悠远漫长的时间隧道,穿过千山万水的空间阻隔,由我们的远祖代代传递、演化、杂交、成型、发展、遗失、兴起、创新并伴随着他们不安与惬意、忧伤与喜悦、热爱与愤恨、愁闷与欢笑种种说也说不清楚的思想情感一直遗留到21世纪的今天。两组“信天游”唱得好:

山曲儿(那个)好比天上的月儿,灭了朝廷灭不了(那个)曲儿。

朝朝唱(来嘛),代代(你就)唱,也不晓得(哎)唱死了多少皇上!

这是让我常常对山歌文化感喟不已的所在之一!

我对山歌的适应与接受、秉承与热爱,来自于土一把汗一把的祖辈们、父辈们的血脉传承。我的祖籍在山西什么地方,连我的老爷爷也说不清了。先人们大概在明朝的灾荒乱世年间举族来到陕北高原,为了便于生存又分家迁居开来。这样,我便无可选择地生在穷山连绵之某处褶皱中的一孔又小又破的石渣子窑洞里,长在那儿了。那个地方现在被叫做子洲县三川口乡田家沟村圪堵岭上。三十岁以前,除了在西安求学两年外,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光大部分都是在家乡的山峁沟壑里度过的。祖辈父辈既是务实的庄农,又是当地“闹红火”的民间艺人。我在与他们同甘共苦、血肉相依的焦苦日子里,效仿他们“活人”的法子——体力劳动诀窍、人情势理法则、道德品质要害的同时,学会了他们永世唱不完的“信天游”,跟着他们“闹秧歌”、“搬水船”、^②“唱戏”、“当伞头”,^③在听着和唱着“信天游”的过程中长成椽一样高的一条后生,从此,就魂牵梦绕地爱上了山歌。而立之年,我带着研究民间文艺学的热望离开了让我亲不够怨不够恨不够爱不够的黄土高坡,单枪匹马地闯进了兰州,在与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西北其他民族下层民众开始密切交往之始,关注、学会并一往情深地爱上了当地的另一种山歌——河州“花儿”(以下称为“花儿”),于那种如泣如诉的歌声中翻来覆去地体会他们的苦难经历、民族情感和悲情命运。后来,参加“花儿会”、深入“采风”,我像其他民间歌手们一样,兴之所至也就“拴下个太阳了唱吧”,俨然被当地的“花儿好家”们当成了“花



儿唱家”。^{④⑤}一晃十年过去了，我成了一个城市人，兰州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但是我的骨子里还是个爱说、爱唱、爱扭的乡下人。因此，研究河州“花儿”（以下简称“花儿”）、研究陕北“信天游”以下简称“信天游”，是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儿子永远割舍不下的爱。

这样一种刻骨铭心般的爱的招引，除了所爱对象生动活泼的艺术形态之外，更有一种理性的因素隐含在里面。“花儿”与“信天游”是我国现有山歌矿藏储量当中历史渊源最为悠久、形态特征最为典型、流传地方最为广阔、影响力最为深远的两个山歌体系。它们共同诞生在自然环境相似的西北高原上，是以当地汉族为主、其他少数民族为辅缔造和传承下来的，经过了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互之间有着从显性到隐性的诸多联系，曲调、歌词、风格、唱歌情境方面又迥然有别，跨越了民族性与地域性：同中有异，异中常常有同，具有非常大的可比性。正因为如此，唱起它们，思考它们，我的角色转换在自然而然、不知不觉的过程中进行下去……

对于一个民歌工作者来说，倾心的歌唱总是能诱发他研究的热情，在沉思中检索歌唱的诀窍；而冷静的思索又使他不由地唱出声来，在歌声中体会民歌的奥妙，进而把探寻的目光再次转向已有的民歌研究：歌唱与研究原本是互倚互重、互助互益的。要说这两种山歌，有关“花儿”研究与“信天游”研究虽然为时已长、前辈学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其成果也可谓蔚为大观，但是，“花儿”与“信天游”的本真面目至今还不是十分清晰，从文化角度比较“花儿”与“信天游”的异同之处至今还是一个崭新课题，“花儿文化”、“信天游文化”乃至“山歌文化”的概念还没有人提出，当然也没有人论述，建立山歌文化体系更是一块无人涉足的领地。学术研究的生命在于创新，本人来自民间，在河湟谷地和陕北高原有着长期的生活经历，因为熟悉“花儿”和“信天游”，从而热爱这两种山歌；因为



热爱这两种山歌,从而更加熟悉“花儿”和“信天游”:完全可以由此着手,去填补这个空白点。

我的这种学术想法萌生于长期的“采风”活动、歌唱实践、大量阅读、反复思考的过程中,“山歌好唱头难开”,我愿意知难而上,探索这一神秘的课题,以自己的辛勤劳作求教于方家和众多“采风”者。

以下,请允许笔者先从“花儿”与“信天游”的研究开始。

作为学理,中国民间文艺学发轫于五四运动时期,在 20 世纪经过了五个高潮阶段——五四运动时期、延安文艺运动时期、新中国建立时期、大跃进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为了论述的方便,本人将第三个时期和第四个时期合为一处,而把第五个时期分为两个阶段进行论述。旧的时代,山歌研究处于东鳞西爪、时断时续且被歧视的状态里,“文化大革命”十年受到大的政治冲击,几乎完全停顿。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全国各省纷纷恢复了民间文艺家协会等专门机构,山歌研究受到党和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花儿”和“信天游”发现、搜集、整理、研究过程中的起承转合与整个中国社会体制及其影响下的民间文艺学学术命运是密切相关的。它们在不同年代进入了人文科学工作者的视野又双双辉煌于 20 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最终还得归功于我们这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

一、“花儿”研究述评

1. 解放以前的“花儿”研究

“花儿”研究源于中国现代史上北京大学的歌谣学运动,初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于 30 年代至 40 年代掀起高潮,和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兴起一脉相承。有关这一阶段的“花儿研究”,我们现在容

易见到的资料是张亚雄的《第一本〈花儿集〉成书的前前后后》、柳湟乡的《张亚雄的第一本“花儿集”》、魏明章的《半世纪以来的花儿研究》、^⑥魏泉鸣的《抗战前后的花儿研究及其特征》、^⑦刘凯的《袁复礼教授与花儿》、《慕少堂先生与花儿》、《〈歌谣周刊〉与七十年来的花儿研究》等。^⑧1940年，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张亚雄编撰的《花儿集》代表着本段时期“花儿”研究的最高成就。

这一时期的“花儿”研究先由介绍起步，注重完整形态、原汁原味的搜集整理，初步出现了从民族学、心理学、社会学、地理学、运动学、生理学角度剖析“花儿”的现象，朝分析、综合、比较的方向发展，片言片语往往一语中的。研究范围涉及“花儿”的渊源、产生地、流布地域、命名、种类、歌手身份、影响因素，音乐中的曲谱、音调，歌词中的音节、结构、修辞，歌唱中的嗓音、呼吸、情绪、表情、风格、形式，歌中的背景、地名、民俗、传说、方言等。其文章散见于当时的多家报刊。截止到目前，“花儿”研究基本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当时的甘肃、青海相对僻静，信息闭塞，新的政治狂潮还没有席卷过来，沉闷而平静的社会氛围带给本地民歌研究的影响，使其卷入人数多一些，政治色彩淡一些，学术气味浓一些。文人与音乐家对于“花儿”的改编、再创造初露端倪，这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和时事所迫有关。上述成果为以后“花儿”的高水平研究、“花儿学科”沿着更加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无疑是开了一个好头。其缺陷是除了张亚雄、谢润甫、牙含章、萌竹等个别学者对“花儿”有些整体性、系统性的真知灼见外，多数研究者对“花儿”的认识停留在感觉、直觉基础上，其论述要么是人云亦云，相当浅薄，要么是大而无当、任意发挥。研究中心地只限于兰州、西宁。研究者笔下的“花儿歌手”均以下层社会群体职业身份的面目出现，无名无姓。搜集研究者基本是当地知识分子，也有在此处作短暂生活的外地人，多数为受过新潮教育而转变了观念的较有身份的文化人。他们眼睛向上，不向老百姓踏踏实实地虚心去学。研究者一个个处于“孤军奋



战”之状态里,没有学术争论,备受时人歧视。

2.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以后的“花儿”研究

“花儿”研究的第二个高潮是20世纪50—60年代中间的十七年,其基本材料见于1982年10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编印的《“少年”(花儿)论集》、^①1955年至1976年的《民间文学》杂志。

本时期“花儿研究”与20世纪50年代举国上下的民歌运动有极大的关联。特别是1957年前后,全国宣传媒体为这场活动摇旗呐喊,甘、青、宁、新各级政府大量收集“花儿”,出版《“花儿”选》,召开“新花儿”现场会议,以听报告、现场观摩、“花儿”竞赛、讨论、贴大字报、举办“民族民间文艺汇演大会”等形式催发“新花儿”产生。一时间,“开拓了诗歌创作新道路”、控诉旧社会、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反映大跃进高潮中英雄事迹的“新花儿”到处都是,“花儿”进入城镇,登上舞台,有乐器伴奏,与舞蹈结合,出现了群众创作的“花儿”表演唱、男女联唱、老小对唱、婆媳合唱、小孩合唱、全家合唱、全村合唱等形式,唱“花儿”的禁忌全部被打破,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创作、演唱“新花儿”运动,概念化、口号式、生搬硬套、重复空泛、就事论事、有啥说啥、粗糙简单、易记易忘的“花儿”连篇累牍地出现了。各种集子收集上来的传统“花儿”虽有一些文化价值,了无新意、假大空的“花儿”多而又多,连不是“花儿”的山歌也充斥于《“花儿”集》中。应和着这种“新花儿”的创作局面,不少研究者的文章一味赞颂时代、赞颂人民、赞颂生活、赞颂民歌,一派歌舞升平、阿谀奉承之词。民歌运动与两条道路的斗争被结合在一起,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被大力提倡,特定时代以政治任务动员或命令“花儿”创作,以政治标准要求“花儿”创作,以群体规模展现或标榜“花儿”创作,以文人眼光评价“花儿”质优质劣,要求“花儿”创作按照文人思路进行。多数学术文章总是



一个总论点下几个分论点,按次序往下顺延,不是去论证,倒好像事先想好了,分量不够,例子来凑。多半文章是政治回音或时代“马后炮”,了无学术价值。学术论争局限于小范围的几个人,没有实质性结论。

另一方面,本时期“花儿”的搜集、改编、创作、研究也有一些成绩。“花儿”旧唱腔得到了加工提高,新曲调创作出来了,出现了“花儿”器乐合奏曲、“花儿”曲舞、“花儿”剧。“花儿”曲调发展成的多声部小合唱进入了电影艺术,不少“新花儿”、特别是控诉旧社会的“花儿”变为经典之作。“花儿叙事诗”有了发展,各种“花儿”选集越来越多。“花儿”歌手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有了类似歌手、作者、研究家三位一体的人物。“花儿”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层面向更加广阔、更加深入的地方掘进。上一阶段“花儿”研究涉及的领域被更加全面、细致、理性地展开以后,“花儿”的称谓、定义、内涵、主题、作品、作者、“花儿会”等,衬词、衬句、格律等,曲调名称、唱腔技术、歌唱原因、歌唱禁忌、不同唱法等,曲调与情感、曲调与歌词等,“散曲”、“番曲”、“凉州豪嘈”与“花儿”的关系等,步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花儿会”称谓得到了学界与社会的统一认可。很多学者开始从民族学、历史地理学、诗体学的视角研究“花儿”,提出“花儿”抢救搜集的重要性和整理原则,强烈建议:编唱者深入群众生活,加强学术修养,研究并总结“花儿”的艺术特色和发展规律,着重从“花儿”的格律形式和创作过程入手,找出其内在的科学性,对“令”、衬句、歌词要有机结合,思想和艺术不能偏废,夸张要有现实基础,在“花儿”唱词形式上注意要求,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有关“花儿”形式的提高和创新、“花儿”来龙去脉的学术争论,更是把“花儿”研究引向深入。

3. 新时期“花儿”研究

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甘、青、宁、新被扭曲压抑了十



年之久的民众歌喉得以彻底解禁，“花儿”脱离开高强度的政治禁锢，旧“花儿”再次面世，新“花儿”不断产生，展现出了勃勃生机，回荡在山间野外和广播、电视、收音机、录音机等多种声响媒体里。消失了多年的传统“花儿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复现，新的“花儿会”不断衍生，盛况空前，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力配合与积极引导。各种形式的“花儿”调演、“花儿”大奖赛不断举行，我们所能知道的绝大多数“花儿歌手”都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花儿”沿着健康的方向大踏步迈进，开始走向国外。

与此同时，“花儿”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全面展开了。文化工作者深入“田野”，收集“花儿”并汇编于一体。“花儿集”数量比之以前虽然下降了一些，但绝大多数选本有乐谱，有注释，编选的科学性越来越强，与“花儿”在民间的蕴藏量和分布区域越来越相符。甘肃和青海还分别成立了“花儿研究会”，频繁召开“花儿”学术讨论会。老一代“花儿”研究家宝刀不老，新一代研究者又迅速崛起，“花儿”研究进入省际的协作，被有组织、有步骤、张弛有节地进行开来。原有的研究命题被进一步分解，更加细微化；“花儿”源头、产生时限、“原型形成”与“流变”关系，《诗经》、北朝民歌、词、洮岷“花儿”分别与河州“花儿”的关系，“花儿歌手”与观众、评论家的关系，“花儿”的影响因素归类，“花儿”的音乐研究和民族研究，“花儿歌手”与“花儿会”研究等成为新的学术亮点。“田野作业”对“花儿”及其相关材料的基本状况彻底摸清，使得多数论文立论有据。一些研究成果从科学的实际性考察着手，学术分析更加条理化，推论有节。很多研究者从气候学、民俗学、文艺学、音乐学、语言学、接受美学等学科方向破解“花儿”之谜，提出建立“花儿学”的研究构想，带给学术界耳目一新的研究气氛。“花儿”研究既有“面”上的描写研究，更加具有整体性；又有“点”上的问题研究，探讨相关因素通过何种渠道、如何影响“这一点”。“花儿”的命名、源流、产生地、流传地、传播路径、思想内容、章句格律、曲令、曲调结构、子



母令、衬字衬词、“花儿会”等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有的已经基本定性。研究者对于同期各种“花儿”研究成果都有过中肯、公允、辩证的评价,有了不破不立的立论原则。学术争论的范围更广,注重以理服人。“花儿”在学术研究、经济活动、民族关系、群众文化生活方面的多重价值被学人们认识到了。“花儿”研究进入了黄金季节,硕果累累,整体学术含金量越来越高,正朝着科学化、多元化、精粹化的方向挺进。其概论性的研究专著有赵宗福的《花儿通论》,^⑩ 郝慧民的《西北花儿学》,^⑪ 个人和集体论文集有《花儿美论》、^⑫《“少年”(花儿)论集》、^⑬《花儿论集》、^⑭《花儿论集 2》、^⑮《花儿论谭》等。^⑯

有成就就有缺陷,本期“花儿”研究的弊端表现在如下方面:“花儿”选本所收不全是“花儿”,特定“花儿”到底流传在哪些地区没搞清楚。“花儿”个案研究少,研究者水平良莠不齐。有的调查研究事先没有周密计划,看到哪,写到哪,像一篇游记。“花儿”的产地在青海还是在甘肃,争来争去,近似无聊。部分论文缺乏确凿的实证材料、严密的逻辑推理、严格的科学论证,想当然地想象、猜测、推论,要么没有结论,要么轻易下结论。个别“学术大家”在不懂“花儿”的前提下评论“花儿”,以讹传讹。权力话语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仍在,动不动就把“花儿”往政治上靠,神化劳动人民……

4. 世纪之交的“花儿”研究

20世纪90年代开始,“花儿”在国内和国际渐渐有了影响,民间“花儿”演唱活动却一步步开始衰落,“花儿”的搜集、抢救、整理、出版工作再次由政府出面,协调进行,甘、青、宁、新的“花儿”第一次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收集,个人演唱的“花儿”集子以及其他民歌选本也在不时面世。

伴随着“花儿”的不景气,“花儿”研究水平在徘徊中上升,新老“花儿”研究队伍的接替也不尽如人意。“花儿”研究的文章较前少